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朱彦刚^{1,2}, 贺灿飞^{2,3}

(1.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深圳 518055;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3.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国际上通常认可邓宁的折衷理论作为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式,但是该范式主要是针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并不完全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日益扩大,对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国际投资理论和贸易理论综述了国际上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理论发展,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国际化模型,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探讨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描绘了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动向。

关 键 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综述

1 引言

国际直接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开始逐步转向服务业,特别是近年来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使服务业FDI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新引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业投资以每年15%的幅度急剧增长,目前已占全球FDI流量的一半以上。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指出“在所有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均转向服务业”。2002年,服务业FDI存量达到全球FDI的60%,服务业FDI流量也上升到全球FDI流量的67%^[1-2]。

随着服务业FDI的迅猛增长,对于服务业FDI区位的研究显得日益重要,国际上经济地理和国际经济学者纷纷转入此项研究中^[3-7]。现有研究主要遵循两条思路来探讨服务业FDI区位:一些学者将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应用到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另一些学者则将国际贸易理论应用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中。本文将通过服务业FDI区位相关文献的综述探讨服务业FDI的理论框架和中国服务业FDI区位研究的发展趋势。

2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发展

国际上外资区位理论研究主要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引申出来,这些理论主要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或者什么跨国公司能够成功地对外直接投资。一些理论也关注外资区位选择,尤其是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尼克伯格的寡头垄断论、约翰森等的公司国际化过程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甚至波特的竞争优势论都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8]。但是,经典的FDI理论是基于制造业FDI的,对服务业FDI未必有足够的解释性。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及扩张形式都与传统制造业跨国公司不同,因此对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对于制造业FDI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业FDI,学者们做出了深入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服务业FDI的研究并不需要新的理论^[3,9-11]认为虽然FDI现有的理论可以应用到服务业去,但是必需考虑到服务业的典型特征。通过在某些条件下对跨国公司于直接投资概念的分解,Dunning^[11]认为对国际生产折衷范式的修正可以应用于服务业FDI的解释。

收稿日期:2011-05; 修订日期:2011-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65,41071075)。

作者简介:朱彦刚(1987-),男,湖北公安人,硕士,主要从事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区位等研究。

E-mail: zhuyangang@foxmail.com

2.1 FDI理论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解释

2.1.1 垄断优势理论对服务业FDI的解释

海默根据对美国FDI的研究,由于市场的不完全,少数企业拥有寡头垄断优势,并能借助优势克服跨国经营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有力的竞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优势是其FDI的有利条件,也是FDI理论的出发点。海默的理论是相对最能在以后同时适用于服务业FDI的。李慧中^[12]在市场细分条件下,产品变体差异优势使跨国公司产品取得与当地企业和其他跨国公司不同的独特地位,而变体生产优势就来自于海默的寡头垄断的企业优势。曲凤杰^[13]也认为海默的所有权优势理论可以一定程度地套用在服务业上。根据该理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优势是其FDI的有利条件,少数拥有了寡头垄断优势的企业能借助专利、商标等优势克服跨国经营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有力的竞争。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服务业FDI的适用性

薛求知^[14]认为,弗农^[15]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针对当时制造业竞争加剧,成熟期产品的技术已不再居于主要地位,降低产品成本成为制造业跨国公司扩张的主要动力,而这对于性质较特殊的服务业产品来讲是比较不适用的,虽然服务业产品可能存在生命周期,但是价格竞争绝不是服务行业的主要竞争因素。但是由于服务的5个基础特征^[16]:非实体性、异质性、不可分割性、顾客参与性、不可储存性,使得服务业FDI在国际化经营中与当地企业相比没有成本优势^[17-18]。弗农后来针对服务业的FDI指出,知识的转移可以代替物品转移,那么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理论就可以应用于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解释。但李慧中^[12]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不适用于服务业的FDI。原因在于:从供给一方看,毕竟大多数服务始终是劳动密集性的,没有制造业产品在生命周期中从技术到资本再到劳动力的密集要素相继轮换的明显过程;从需求一方看,制造业的生产中心在不同生命阶段替换并不影响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销售,而不可运输的服务随所谓生命阶段的不同期变换生产中心,岂不是在要求各方需求者跨境消费?动态成本谷地可以是制造业轮换的世界生产中心,却不能是服务世界生产中心。

2.1.3 内部化理论对服务业FDI的适用性

Buckley等^[19]于1976年提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

跨国公司进行FDI不一定需要拥有独特的垄断优势,而只要创造出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结构或内部市场,从而解决由于市场不完全带来的不能保证的内部供求安全问题。这种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内部化一些中间产品的国际市场组织。Buckley等在原有“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说明服务企业也有内部化中间市场的优势^[19]。Carson强调,服务消费中买者的不确定性是市场不完善的来源之一,将会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一种必要。Rugman^[20]、Yannopoulos^[21]、Gray等^[22]、Pecchioli^[23]等均以银行业为例分析了内部化理论的适用性。但是,李慧中^[12]认为,按照内部化理论,则是国为本国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通过市场供应不经济或不完全,所以要跨国生产中间产品,而这个产品主要是配套于本国生产的。内部化优势理论至少不能从一般意义上解释最终产品的跨国生产的。对于最终产品的跨国生产,用内部化来说明跨国公司,还不如用跨国公司来说明内部化:第一,由于其不可运输性,跨国生产的服务不可能内部化地服务于本国生产;第二,服务生产是离不开直接消费的生产,并不具有像制造业那样的多阶段生产的特点。薛求知^[14]在《跨国银行管理》中也指出了4点关于Rugman对内部化理论在跨国银行中解释的缺憾,内部化理论对于服务业FDI是不那么适用的,特别是对于作为最终产品的服务业FDI的动因是不能解释的。

2.1.4 邓宁折衷理论对服务业FDI的解释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邓宁结合前人研究,提出了一个解释国际生产活动的折衷框架。20多年来邓宁一直在扩充和完善这个框架^[11,24-28]。其中,邓宁^[11]在他提出折衷理论的12年后对他的理论在服务业FDI的适用性上作过补充。他在所有权优势理论方面补充指出了质量、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技术与信息、声誉以及创新等企业优势对服务业FDI的影响;在区位优势方面强调了东道国人口众多即聚集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稳定、政策法规灵活等条件,而无法再强调成本优势;在内部化优势方面,则只能强调弱化或消除要素投入在性质和价值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中间产品的质量保证金等。邓宁的补充是有改进意义的,但是在80年代末,就有学者开始对邓宁理论适用性提出质疑。

2.1.5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服务业FDI的解释

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

业研究者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价值链理论。其中, Porter 的价值链最为流行, 不过 Kogut 的价值链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却更为重要。此外, 生产网络学说也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有不小的贡献。服务业跨国公司的价值链也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网络中。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应用到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中去, 20 世纪 90 年代, 一些学者在价值链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全球价值链理论^[29], 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 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 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并进一步提出了由生产者驱动和采购者驱动的全球商品链的二元驱动模式。服务业外商投资多属于采购者驱动价值链模式, 采购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 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 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 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代理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2.2 贸易理论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解释

除了经典的 FDI 理论之外, 另外一条线索是主张以国际贸易理论解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试图将跨国公司引入到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中。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曾引起国外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 传统的国际贸易原理不适用于服务贸易^[30]。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贸易原理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 没有必要把服务贸易同一般国际贸易区别开来^[31-32]。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 它既肯定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对于服务贸易的适用性, 同时也承认具体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上的缺陷, 主张在利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服务贸易时, 必须对传统理论进行若干修正^[33]。总的来说, 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国外学术界较多的认可。国际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形式, 国际贸易理论是可以适用的。但是, 由于服务贸易具有许多货物贸易所不具备的特征, 在运用以后者为实践基

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前者时, 必须对之进行适当的修正。

对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在服务贸易中的应用, 比较突出的学者有 Markusen 的一系列研究^[34-35]。1988 年, Markusen^[34]借助垄断竞争理论, 对熟练劳动力的服务贸易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989 年, 他建立一个两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来探讨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性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国际贸易^[35]。Markusen 研究发现: 与贸易一样, 服务业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种是“垂直型”或者说是产业内的外商直接投资, 指的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其在某个产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35]。另一种是“水平型”或者说是产业间的外商直接投资, 指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企业利用产业间相对的优势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像国际贸易一样, 世界上多数外商直接投资属于后一种类型。从而构建了服务业国际化的贸易和投资相结合的理论范式。她认为: 当两个国家大小类似, 但是要素禀赋有较大差异的时候, 垂直型的跨国公司主导生产。当两个国家大小和要素禀赋都相似, 并且国际贸易成本适中或者较高的时候, 水平型跨国公司主导生产。国内公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主导生产: ①当国际贸易成本较低并且要素禀赋类似的时候; ②当国际贸易成本适中, 要素禀赋类似, 国家之间大小相差很多的时候。这种对贸易现象的实证研究表明, 现实的国际贸易与标准的 H-O 理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其分析结果是, 允许生产性服务等特殊中间投入贸易优于最终产品的贸易, 中间投入的自由贸易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福利同时增加。但是, 随后 Markusen 把这一分析延伸到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时, 却发现跨国公司的生产性服务优势将在东道国商品生产中造成垄断, 从而可能使东道国的福利减少。

Banga 研究发现, 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贸易理论可以适用于服务业 FDI, 但是他们也必须解释为什么服务业国际化扩张选择对外投资方式而不是贸易方式。他们尝试将服务业直接投资纳入一般那均衡利息^[36]。企业特性、国家特性和贸易成本被用来解释均衡。在贸易体系中, 有两种方式的 FDI, 一种是垂直投资, 利用比较优势; 另一种水平投资, 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

然而, 两种理论对服务业国际扩张为什么采用 FDI 而非贸易进行不同解释, 并解释了 FDI 的形

式。两种理论各有优点。传统 FDI 理论的解释更加便于实证证明,贸易理论可以解释服务业 FDI 的本质和选择 FDI 而非贸易的原因。然而,有一些服务业特征两种理论都没有涵盖,需要特别注意:①在制造业中,因为价值链的劳动密集环节和非劳动密集环节可以分散开来,生产过程的片段化可以发生,不同的功能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但是由于服务业的低贸易性,服务业的价值链片段化分割难以实现。服务业外资如何实现跨国化?②服务子公司没有制造子公司倾向于参与企业内贸易,而且服务子公司比制造子公司更加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这对于服务业 FDI 的发展有何暗示和导向?③除开上述特征,管制对于服务业 FDI 和服务贸易的作用和影响比制造业 FDI 和贸易要大得多,更应当纳入对服务业 FDI 的讨论体系。

3 服务业直接投资特点及国际化模型

3.1 服务业外商投资的特性

服务业存在不可储存和不可贸易(除非嵌套在产品里)的特征,因而其生产和消费必需具有同时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比贸易更适合服务业国际化。Feketekuty^[30]认为服务业外资在大多数国家受到的管制和约束较大,是服务业外资的重要特征;Li 等认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服务比制造业产品更难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5];Boddewyn 也认为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割,使得它必须要采用对外投资方式^[3]。杨春妮综合服务生产和消费的特征、服务业竞争的特征以及服务业价值链的特征将服务业外资典型特征概括为^[37]:①服务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②服务生产对人力资本的较高要求;③服务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按提供方式把国际服务贸易定义为以下 4 种交易形式:①过境交付(Cross-borders supply),即从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②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即在一缔约方境内向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③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即一缔约方在其他缔约方境内设立实体性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④自然人移动(Movement of personnel),即缔约方的自然人在其他缔约方境内提供服务。

其中 1、2、4 三类为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定义的服务贸易,而第 3 类“商业存在”即指服务业 FDI。GATS 定义的服务业 FDI 有 3 层意思:①一国服务提供者(法人)在某外国通过某种形式拥有商业实体;②该服务提供者在该外国境内提供服务;③该服务提供者通过其商业实体提供服务。由此可见, GATS 定义的服务业 FDI 仅指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而全部的服务业直接投资还应包括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即一国服务提供者在某外国建立服务生产实体向其他国家提供服务的活动。完整的服务业 FDI 的概念应该是:由外国投资者在一国建立生产和(或)经营实体向该国境内或向其他国家提供服务的活^[37]。

3.2 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的差异

Vesna^[38]比较了服务业 FDI 和制造业 FDI 的差异,通过对 1999-2006 中东欧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 FDI 决定因素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指数对于服务业 FDI 显著而对于制造业外资不显著,说明服务业 FDI 更看重稳定的市场环境;工资变量对于服务业 FDI 不显著,对于制造业 FDI 不显著,说明 FDI 更加是市场追寻型,而不是像制造业一样追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市场规模和经济开放程度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 FDI 同样重要;私有化程度变量对于制造业 FDI 显著,而对于服务业 FDI 不显著;自由化和规制对服务业 FDI 显著而对于制造业 FDI 不显著;金融基础设施对制造业 FDI 没有影响,却对服务业 FDI 特别重要。贺灿飞等^[39]对于银行业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杨春妮^[37]基于其“1+3+6”框架总结出了服务业 FDI 区别于制造业 FDI 的特点,可以总结为:①越是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程度高的服务部门越倾向于选择直接投资作为其国际经营的方式;②由于服务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时会采取跟随客户的方式^[7,37,39-41],母国其他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该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相关;③大部分的服务业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的;④服务业企业会选择人力资源丰富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⑤服务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使服务企业倾向于选择已经存在自己老客户的区位进行投资;⑥可贸易的服务行业将选择具有良好 ICT 基础设施的区位进行直接投资。

3.3 服务业企业国际化模型

服务业企业国际化过程与制造业企业存在较

大差异。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化过程的公认理论,如:Uppsala模型^[42]和国际化的网络模型^[43]并不都适用于服务业企业。

Roberts考察了商业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发现商业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一个渐进化的过程,但是有别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过程,并不是所有商业服务企业都经历了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44]。此外直接出口和企业内出口在商业服务企业的海外扩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O'Farrell等^[45]研究发现,Uppsala学派^[42]提出的极端理论和其后创新扩散模型都不能为中小商业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满意的解释,但是一些企业被客户的国际化拉到国外为国际化的网络理论提供了支持。Bell^[46]的研究发现,小计算机软件企业通常会跳跃一些国际化阶段非常迅速地实现国际化,阶段理论和网络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小计算机软件企业的国家化。当前,对零售业的国际化分为5种不同的理论:拖动和拉动因素理论、国际化阶段理论、折衷范式理论、价值链分析理论、网络和关系理论。

近年来,针对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过程,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寻求一些适用于服务业企业的国际化模型:

(1) 国际扩张三阶段理论

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中的运用跨国公司绩效与国际化程度的关系不仅仅是对于学术界也是对于公司战略至关重要的一个话题。过去,近年来,许多对于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国际化发展中既有获得优势的一面,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忽视。至于究竟是负面效应占据主导还是更多地获得了正收益则是近年来讨论的焦点。最近一些学者对于制造业跨国公司国际发展不同阶段的绩效实证研究,结果产生了两个相反的U形效应关系。U形关系表明国际发展在初始阶段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国际化发展的深入,则逐步转化为对绩效的正面影响^[47-48]。而倒U形关系表明在国际发展超出一个最优水平后,会损害企业的绩效^[49-50]。

基于过去对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研究基础,Contractor等对原有的相互矛盾的U型和倒U型效应进行整合^[51],形成了新的国际扩张三阶段理论,产生S型曲线效果:①阶段一,向下的倾斜曲线,由

于最初的国际扩张成本和壁垒,企业业绩是下降的;②阶段二,向上的延伸的曲线,由于国际扩张的收益逐步实现,公司绩效与国际化程度转为正相关;③阶段三,向下倾斜的曲线,由于国际扩张超出了最优范围,企业绩效反而下降。

(2) 服务业跨国公司二维协同效应模型

传统FDI理论在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中的诸多不适应性。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往往不是能用所拥有三类优势的多少来进行解释。其国际化发展更确切地说是源于服务企业整体跨国经营活动本身的许多特点,无法为单纯的局部企业或国内企业所拥有。因此,针对服务业跨国公司许多特殊性质,有必要换一种角度和思维来审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发展。

对此,郑琴琴提出服务业跨国公司的“二维协同效应”^[52]。已有研究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发展动因的探讨、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发展各阶段的绩效表现以及对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和地理位置的研究等等,并没有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各种表现进行系统的论述,找出其中的深层次根源。郑琴琴认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发展时,通常是以全球利润源为中心,坚持经济—管理二维协同效应,即以全球利润为本源,借助国际化发展中服务的经济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来实现企业的全球发展,并根据这一思路来灵活地进行国际发展模式选择^[52]。三阶段理论认为,所有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国际化发展中,国际化发展与绩效的关系均会表现出“S”形特征。而二元协同效应理论认为:不同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中所表现出的服务经济协同效应,即全球规模经济和全球范围经济效应是不同的;而且不同服务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营销等管理方式和手段运用的不同,所带来的服务管理协同效应也会大相径庭。服务业企业国际化的二元协同效应模型表现出了与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相比在研究视角上的巨大差别。服务业跨国公司应以全球利润源为中心,借助服务经济协同效应和管理协同效应,在实现全球发展的同时,能够撇开过去制造业跨国公司诸多类型优势的考虑,而灵活地选择各种发展模式以及更多的外部联系。这与一些研究中探讨的服务业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和地理位置选择是不相矛盾的。

4 服务业直接投资研究现状

4.1 服务业直接投资研究进展

邓宁的折衷理论在解释服务业FDI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挑战,服务业FDI亟需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Boddewyn在使用传统FDI理论解释服务业FDI的时候发现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会引发一些问题,如对理论假设前提的违背,对服务产业特定优势区分的难度等^[3];Enderwick^[53]认为分析了邓宁理论应用于服务部门时发现服务业很多部门是技术复杂性较低的行业,确定企业特定优势较难,而且服务业跨国公司经营中广泛采用的非股权安排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对于内部理论有一定影响。此外,进一步深入研究认为,服务业FDI的特质和组织结构越来越脱离公司本身的所有权优势,更加依赖于与外部网络的联系^[54],区位优势对于每个跨国公司的影响也并不相同^[55]。Lijiatiao^[5]认为服务业直接投资理论应当更加丰富,传统的FDI理论能一定程度上解释服务业FDI,但是一些服务业特有的影响因素应当纳入服务业外资的解释模型中,包括更严格的政府管制、适应当地能力、跟随客户以及服务业的可贸易兴致。

Rugman等也认为服务业难以国际化是因为服务业FDI适应上下游产业的灵活性较弱^[56-57]。Bagchi-Sen研究了80年代在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外资在州级的区位选择,发现外资与内资服务业区位存在显著差异,外资服务业更为集聚^[4]。Nachum发现集聚经济显著影响金融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外资企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54]。Kolstad和Villanger研究了57个国家在1989-2000年间吸引服务业外资的决定因素,发现制度是影响服务业直接投资国家区位的最重要因素,服务业与制造业直接投资区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58]。

Rugman和Verbeke认为,一个公司如果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那么它必须具有一些区域约束或者非区域约束优势^[57]。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这些优势包括,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营销优势、产品创新优势、获得新技术和信息渠道优势等。Herman等通过对航空运输服务业的研究指出,航空运输业通过跨国提供核心服务,使得受益者不仅仅是进行投资的母国机构,还包括国外分支机构^[59]。Kumar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区位,发现外资研发部门在区位上跟随领导者,也集聚在

市场广阔、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力量雄厚的国家和地区^[60]。Kundu和Constractor发现外资宾馆倾向于跟随其顾客^[61]。O'hUallachain则发现外资银行高度聚集在美国城市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62]。其他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业^[63-64],部分涉及到保险服务业^[65-67]、广告业^[41,68]、宾馆业^[61,69]、房地产业^[65,70-71]、零售业^[72-76]等。

4.2 服务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服务业直接投资区位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热点,在服务业FDI区位方面有大量的文献,也辨析了众多区位因子。本文总结前人研究,把影响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指标分为7大类:市场规模、母国已有基础、文化距离、政策环境、东道国服务业水平、寡占效应、企业规模等。

(1) 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常用变量包括GDP、人均GDP、经济增长率、市场通达性等。Dunning^[24]、Agarwal^[77]、Davidson^[78]、Culem^[79]等对制造业FDI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Gray和Gray^[22]、Rugman^[20]对于银行业的研究, Terpstra和Yu^[41]、Weinstein^[68]对于广告业的研究,UNCTC^[80]、Schroath等^[81]对于保险业的研究,Dunning等^[25]对于商业服务业的研究均发现,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对服务业FDI区位选择有显著正作用。此外,市场增长仍然是吸引不可贸易的服务行业FDI的关键因素之一^[1]。市场增长速度快意味着较好的盈利前景,这带动了更多的服务企业的对外投资。Li^[5]、Riedl^[82]、Kundu^[61]的实证研究也证明,服务业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型特征。

(2) 母国在东道国已有基础。东道国已存在的制造业FDI规模会对服务业直接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跟随客户是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特点之一^[7,37]。对源于不同国家的跨国银行区位研究验证了外资银行跟随顾客的假说^[63,83]。母国在东道国的制造业基础使得其服务业比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11]。从经验分析结果看,Li等^[5-6]对于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投资行为进行研究,认为在目标市场上的经验和知识对于国际化扩张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表明客户跟随战略仍然是服务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主要动因,企业更加倾向于在它或者它的竞争对手曾经投资过的相关区位进行投资。Yamori研究了影响日本跨国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要素,发现制造业直接投资的规模是日本金融机构海外区位选择的重要解释变量^[63]。近些年来,一些国内研究也进

一步印证了客户追随是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之一^[39,85]。

(3) 文化距离。服务业外资适应东道国文化是其在东道国生存重要基础,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容易受到当地不同文化、爱好、生活习惯影响^[37,54,86-87]。文化差异对服务业外资的影响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在进入初期,文化差异对服务业FDI的成败有重要影响^[5,87],但是到了后期阶段文化差异的影响会越来越小^[5]。

(4) 政策环境。常用变量包括市场化程度、法制完善程度、区位的政治等级、政府运行效率、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政府管制、政策开放程度等。服务业是受到政策约束最多,甚至禁止投资的产业^[37]。政策限制是服务业FDI的主要障碍,发展中国家对于服务业FDI的限制正在逐步解除,但各国的开放程度不一,导致服务业FDI区位选择也存在明显差异,政府管制是影响服务业FDI的重要因素^[88-90]。Raff等实证研究表明,政府限制是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重要阻碍因素^[7]。Kolstad和Villanger研究了57个国家在1989-2000年间吸引服务业外资的决定因素,发现制度是影响服务业直接投资国家区位的最重要因素^[58]。

(5) 东道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经济活跃的地方容易产生新的服务机会,从而引致更大的市场发展需求。因此,服务经济的活跃程度是服务业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时考虑因素之一。东道国服务经济的活跃程度可以体现在自身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经济聚集程度两个方面。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的东道国产业基础越好,服务经济越活跃,也就越容易吸引外资进入^[2]。而服务企业集中的地方倾向于存在更多的服务消费,更高的服务质量和 Service 管理能力,服务经济也就越活跃。比如,跨国银行在同业聚集的金融中心创立银行间市场。Buch的研究也表明金融中心对德国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84]。可见,聚集经济也是服务业FDI的一种区位优势。

(6) 寡占效应(Oligopolistic Reaction)。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就是保护或者加强他和主要竞争者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垄断产业的企业会为了竞争各自的领地而采取“跟随领导者”的模式开展对外投资。大型跨国公司通常采用“跟随领导者”和“交换威胁”的策略^[91-93]。在过去关于石油、汽车、制药、半导体、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大

量研究证明这一寡头战略。关于美国广告代理业的研究也支持这一寡头战略理论^[68]。寡头之间的互动可以影响金融业FDI的区位选择^[25]。

(7) 企业规模。企业规模对制造业FDI区位有显著影响^[79,88,93]。Horst研究了公司特性与公司对外投资的关系,发现企业规模是唯一影响因素^[88]。有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金融业和广告业国际行为有显著影响^[61,68,94]。Li检验了日本、西欧、北美三国9个产业的前30名企业,发现企业规模对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5]。

除了上述显著因素外,一些研究还发现其他影响因素,Banga发现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与服务业FDI区位选择成负相关关系,越是贸易性差的服务业越有可能产生对外投资^[36];Nachum发现劳动力和集聚经济显著影响金融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外资企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54]。

4.3 在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现状

在中国,服务业逐渐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渠道,2006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将近200亿美元,其中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是主要产业^[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保持大幅增长。前8个月全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477家,同比增长22.3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7.41亿美元,同比增长36.75%;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50.7%和45.09%。加入WTO后,中国逐步对跨国公司开放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者服务业。近年来,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逐步转向服务业^[39]。

对于在华服务业外资的研究并不多,但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较为代表性的是殷凤、薛求知、李慧中、杨春妮等。殷凤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演变的特点出发,深入分析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与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服务业引资水平的相关对策^[2]。薛求知在其专著《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中专门讨论了服务业跨国公司理论动向^[14]。杨春妮系统梳理了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证,提炼了服务业FDI投资条件、区位、方式等多个结论^[37]。李慧中针对服务业产品的特殊性,探讨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和投资选择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最能解释当前的服务业

直接投资^[12]。

此外,曲凤杰研究了世界服务产业转移趋势及中国承接服务产业转移的条件^[13]。孙文博对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利用FDI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利用FDI的规模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潜力表现为正相关,和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表现为负相关,由于我国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垄断,使得服务业利用FDI规模和市场化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关联性^[95]。张洁通过对中国27个省份和直辖市2001-2007年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讨论中国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化程度影响显著,而市场规模影响并不显著^[96]。张诚和赵奇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3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18]。也有一部分学者针对部分产业做出了初步探讨。如Wu和Strange研究了1992-1996年间138个保险业外资代表处的区位选择,发现接近保险业行政管理部门、现实与潜在市场需求、外资保险执照开放程度、其他外资规模等影响保险业外资企业区位^[97]。Hong根据2001年中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研究了物流业外资区位选择,发现市场规模、较好交通设施、较高劳动力素质等吸引外资物流企业,物流企业相互跟进造成集聚,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经济政策对物流业外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98-101]。郑伯红和汤建中发现在华跨国银行主要动机是为本国在华投资企业服务、为本国与中国贸易服务以及为部分中资企业服务,跨国银行的布局与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85]。谢守红和汪明峰描述了我国2000年外资金金融机构的区域分布,并以市场规模、政策导向、人力资源、信息流通、历史传统、地缘经济来解释其区域差异^[102]。徐瑞华和杜德斌^[103]描述并解释了上海外资研究开发机构的区位分布。孙一飞和温珂^[104]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空间分布,强调区位模仿行为对研发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

贺灿飞等近年来分别对外资银行业、宾馆业、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39,71,105-106]。在中国城市单元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外资整体来看,决定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制度环境、集聚因素等的影响,但各不同产业之间又存在细微

差异。外资银行更偏好银行业投资环境宽松的城市和金融业规模经济较强的城市;外资星级宾馆则倾向于追随国外客户在中国布局,同时通过与国内宾馆的共聚而获得成本节约与竞争力提升;外资零售业则致力于“全球化+本土化”并重的运作战略来实现其本土布局,其布局主要追随市场,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中小城市扩张,以蔓延方式在城市群内扩散;外资房地产业则主要追随本地市场需求,更受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

5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评述及展望

综上所述发现,服务业FDI理论是在制造业FDI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对制造业FDI理论的改造和简单延伸,还远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化;FDI理论兴起于发达国家,因此传统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主体,加之目前服务业FDI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致服务业FDI理论亦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相对滞后,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综合起来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未来将在下述几个方向上完善:

(1) 根据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如:服务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服务生产对人力资本的较高要求,服务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建立适用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析框架,甄别服务业外资的决定因素,建立有别于制造业外资的分析体系,并探讨服务业外资与制造业外资的互动关系。

(2) 服务环节各价值链片段的研究。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主体不仅包括服务业企业,还包括制造业企业。严格地说,服务业直接投资应该成为各服务环节的直接投资研究。包括:总部、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物流、销售和营销等诸多环节。如今,各跨国公司纷纷将价值链各环节作为战略单位,片段化布局,业务外包和离岸转移已成趋势。以往的以产业划分为基础的FDI研究将转向针对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研究。

(3) 服务业直接投资的产业差异。服务业虽然有一些共同的典型特征,但是具体产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现有的研究或笼统的研究服务业,或针对某一单一产业研究(如金融业、广告业、零售业、宾馆业、房地产业等),但是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具体地、有针对性地系统研究服务业内部差

异如何影响服务业直接投资非常必要。

(4) 服务业外资的政策研究。政策问题是服务业直接投资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领域之一。服务业的价值和成本均很难精确衡量和计算,服务业投资项目的收益评估也很困难。政府对于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监管也比制造业困难。研究服务业外资政策及其经济影响,对于合理利用服务业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意义重大。

(5) 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直接投资研究。已有的服务业外资理论均来自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特点,在服务业直接投资方面也有不同之处。中国、印度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特点,研究的重点包括:服务业外资流入对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的管制、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对服务业外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4.
- [2] 殷凤. 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1(1): 4-10.
- [3] Boddewyn J J, Marsha B H, Perry A C. Service multinationals: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7(3): 41-57.
- [4] Bagchi-Sen S. FDI in US producer services: A temporal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 sectors. Regional Studies, 1995, 29(2): 159-170.
- [5] Li J, Guisinger S.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 multinationals in the triad regions: Japa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23(4): 675-696.
- [6] Li J.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service MNC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1994, 36(3): 305-325.
- [7] Raff H, Ruhr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pplied Economics Quarterly, 2007, 53(3): 299-321.
- [8] 贺灿飞.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 理论与实证分析.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
- [9] Lacayo R, Luis I M. Stud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vs. Service Industries: A Nicaraguan Perspective[D]. School of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2003.
- [10] McKaig B, Alison D. The Global Sourcing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 study of Professional Business Services[D]. Graduate School-Mewark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2001.
- [11] Dunning J 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rowth of services: Som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89, 9(1): 5-39.
- [12] 李慧中. 贸易与投资动因: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 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1): 64-71.
- [13] 曲凤杰. 世界服务产业转移趋势及中国承接服务产业转移的条件. 经济研究参考, 2004(82): 16-29.
- [14] 薛求知. 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及扩张动因. 世界经济研究, 2002(5): 52-57.
- [15]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 80(2): 190-207.
- [16] 薛求知. 当代跨国公司新理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7] Bhagwati J N.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4, 120(4): 678-701.
- [18] 张诚, 赵奇伟.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财经研究, 2008, 34(12): 38-53.
- [19] Buckley P J, Mark C.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Holmes and Meier, 1976.
- [20] Rugman A M. Inside the Multinationals: The Economies of Internal Mark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21] Yannopoulos. The growth of transnational banking//Casso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Irwin, 1983: 89-114.
- [22] Gray J M, Gray P. The multinational bank: A financial MNC.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81, 5(1): 33-63.
- [23] Pecchioli R M. Home-country control on the opening of domestic banks' establishments abroad//Daniel I.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anking.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3: 52-60.
- [24] Dunning J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apers, 1973, 25(3): 289-336.
- [25] Dunning J H, George 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offic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1987, 19(5): 613-631.
- [26]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1-31.
- [27] Dunning J H.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services: Some general and specific explanation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oalition and Competition: Glob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5-122.

- [28] Dunning J H, Lundan S M.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nd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 [29] Gereffi G. A Commodity Chains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Global Industries[EB/OL]. 1999-8-12[2011-4-11]. http://eco.ieu.edu.tr/wp-content/Gereffi_CommodityChains99.pdf, 1999.
- [30] Feketekuty 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An overview and blueprint for negotiations*. Cambridg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Ballinger, 1988.
- [31] Sapir A. Trade in services: Policy issues for the eightie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82, 17(3): 77-83.
- [32] Hindley B, Smith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in services. *The World Economy*, 1984, 7(4): 369-390.
- [33] Tucker K, Sundberg M.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34] Markusen J R. Production, trade and migration with differentiated skilled workers. *Canada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8, 3(21): 492-506.
- [35] 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1): 85-95.
- [36] Banga 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view*, 2005, 1(2): 55-72.
- [37] 杨春妮. 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 理论与实证.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 [38] Vesna B. Do FDI patterns differ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 in CEE countries.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 7(3): 11-25.
- [39] 贺灿飞, 傅蓉.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地理学报*, 2009, 64(6): 701-712.
- [40] Gaedeke R M. Selected U.S. multinational service firms i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3, 4(1): 61-66.
- [41] Terpstra V, Yu C.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 33-47.
- [42] Johanson J, Vahlne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 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1): 22-32.
- [43] Johanson J, Mattsson 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ystems: A network approach*//Hood J. *Strategies in Global Competi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8.
- [44] Roberts J, Joanne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service firms: A stages approach.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9, 19(4): 68-88.
- [45] O' Farrell P N, Zheng J, Wood P 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services: An interregional analysis. *Regional Studies*, 1996, 30(2): 101-118.
- [46] Bell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computer software firms: A further challenge to 'stage' theo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5, 29(8): 60-75.
- [47] Qian G. Assessing product-market diversification of US firm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37(2): 127-149.
- [48] Ruigrok W, Wagner 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erspectiv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3, 43(1): 63-83.
- [49] Daniels J D, Bracker J. Profit Performance: Do foreign operations make a difference?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89, 29(1): 46-56.
- [50] Gomes M, Ramaswamy K.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1): 173-188.
- [51] Contractor F J, Kundu S K, Hsu C. Three-sta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The link between multina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service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3, 33(1): 48-60.
- [52] 郑琴琴. 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扩张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53] Enderwick P. *Multinational service fir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54] Nachum 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location of TNC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FDI to the U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0, 31(3): 367-385.
- [55] Nachum L, Wymbs C. Firm-specific attributes and MNE location choices: Financi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FDI to New York and London. Working paper No.223 for ES-RC centre[EB/OL]. 2002-3-1[2011-4-11]. www.cba.cam.ac.uk, 2002.
- [56] Rugman A M, Verbeke A. Trade policy and strategi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Global Strategic Management Series*, 1992(3): 3-25.
- [57] Rugman A M, Verbeke A. Towards a theory of regional multinationals: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pproach.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5, 45(1): 5-17.
- [58] Kolstad I, Villanger 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24(2): 518-533.
- [59] Herman B, Van H B.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Rotterdam: Netherlands Economic Institute, 1984.
- [60] Kumar N. Determinants of location of overseas R&D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case of US and

- Japanese corporations. *Research Policy*, 2001, 30(1): 159-174.
- [61] Kundu S K, Contractor F J. Country location choices of service multinational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secto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999, 5(4): 299-317.
- [62] O' hUallachain B. Foreign banking in the American urban system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1994, 70(3): 206-228.
- [63] Yamori N. A not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multinational banks: The case of Japa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98, 22(1): 109-120.
- [64] Merrett D 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ustralian ba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02, 12(4-5): 377-397.
- [65] Moshirian F, Pham T. Determinants of U.S.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abroad.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0, 10(1): 63 - 72.
- [66] Li J and Moshirian 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insurance services in the US.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4, 14(3): 249-260.
- [67] Moshirian F. Source of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services.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1999, 9(2): 177-194.
- [68] Weinstein A K. Foreign investments by service firms: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advertising agenc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1): 83-92.
- [69] Contractor F J, Kundu S K.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cross firms: The case of the hotel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1995, 1(1): 87-124.
- [70] Gerlowski D A, Fung H, Ford 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U.S. real estate: An empirical analysis. *Land Economics*, 1994, 70(3): 286-293.
- [71] He C, Zhu Y. Real estate FDI in Chinese cities: Local market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0, 51(3): 360-384.
- [72] Coe N M, Hess 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tailing: Implications for supply network restructuring in East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5(4): 449-473.
- [73] Dawson J A.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tailing oper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1994, 10(1): 267-282.
- [74] Dawson J A. Scoping and conceptualizing retailer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4): 373-397.
- [75] Wang S. Foreign retailers in post-WTO China: Stories of success and setbacks.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009, 15(1): 59-77.
- [76] Tacconelli W, Wrigley N.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responses of retail TNCs in Post-WTO entry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85(1): 49-73.
- [77] Agarwal J P.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urvey.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0, 116(4): 733-773.
- [78] Davidson W H.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0, 11(2): 9-22.
- [79] Culem C G.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direct investments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88, 32(4): 885-904.
- [80] UNCTC. *Transnational Reinsurance Operation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0.
- [81] Schroath F W, Christopher M K. Managerial barriers t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S. property and liability insurers. *Journal of Risks and Insurance*, 1989, 56(4): 630-648.
- [82] Ridel A. Location factors of FDI and the growing services economy: Evidence for transition countr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10, 18(4): 741-761.
- [83] Esperanca J P, Gulamhussen M Z. Testing the 'follow the customer' hypothesis in multinational bank expansion.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1, 11(3): 281-293.
- [84] Buch C M. Why do banks go abroad? Evidence from German data.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struments*, 2000, 9(1): 33-67.
- [85] 郑伯红, 汤建中. 跨国银行在华发展区位优势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01, 10(4): 21-28.
- [86]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 [87] Hofstede G H. *Culture's consequenc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0.
- [88] Horst T. Firm and industry determinants of the decision to invest abroa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2, 54(3): 258-266.
- [89] Hollander A. Foreign location decision by US transnational firms: An empirical study.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84, 5(1): 7-18.
- [90] UNCTC.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1.
- [91] Flowers E B. Oligopolistic reactions in European and Canadia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6, 7(2): 43-55.
- [92] Graham E M. Transatlantic investment by multinational firms: A rivalistic phenomenon.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1978, 1(1): 82-99.
- [93] Knickerbockers F T. Oligopolistic Reaction and the Multi-

- national Enterprise.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94] Ball C A, Tschoegl A E. The decision to establish a foreign bank branch or subsidiary.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82, 17(3): 411-424.
- [95] 孙文博. 90年代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投资环境因子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2003(10): 57-62.
- [96] 张洁. 中国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 212(6): 50-59.
- [97] Wu X, Strange R.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insurance compan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0, 9(3): 383-398.
- [98] Hong J, Chin A. Modeling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ese logistics industry.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7, 18(4): 425-437.
- [99] Hong J. Firm-specific effects on loc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5): 673-683.
- [100] Hong J. Transport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logistics firm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07, 41(6): 597-609.
- [101] Hong J. Location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foreign logistics services in Shanghai, China.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7, 27(4): 339-354.
- [102] 谢守红, 汪明峰.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区位分布研究. *人文地理*, 2004, 19(3): 50-56.
- [103] 徐瑞华, 杜德斌. 上海外资R&D中心区位研究. *经济地理*, 2004, 24(5): 625-628.
- [104] 孙一飞, 温珂. 模仿行为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的区位选择. *科学学研究*, 2006, 24(4): 545-552.
- [105] 贺灿飞, 尹薇. 外资星级宾馆区位选择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10, 19(1): 119-129.
- [106] 贺灿飞, 李燕, 尹薇. 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 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世界地理研究*, 2011, 20(1): 12-26.

A Literature Review on FDI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ZHU Yangang¹², HE Canfei²³

(1.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unning's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 paradigm to expla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owever, this paradigm mainly focuses on manufacturing FDI, which might be not applicable to FDI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fast growing of the ratio of FDI in service industries, researches on services FDI have become a new focus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geography.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review on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FDI by integrating both traditional FDI theories and trade theories. It analyzes the fe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models of services FDI and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services FDI and manufacturing FDI. Besides, it makes a review on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FDI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services FDI in China and predicts the prospect of the trends of services FDI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services FDI; location; literature review

本文引用格式:

朱彦刚, 贺灿飞.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4): 498-509.